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意義

生命的重要性對人而言，是唯一的，是無可替代且是超經驗的。因此對生命的尊重，自古中外皆然，西方以意志與命運的抵抗精神，呈現一美學張力與追求人類尊嚴的勇氣。而我國一向講的是天地有好生之德，人當敬重與之匹配，並進而追求超越生命的時限，遂有求長生不老藥的追求，一種迴避「死」渴求「生」的「永生」「不死」態度。但就生物學角度看，生物註定在一出生就走向死亡，誰也沒有例外，正如存在主義的死亡哲學觀：「真正的存在是走向死而存在」。其真正含義一則是人生下來即步向死亡，一則是人本來即為死而存在的，這種事實雖是殘酷卻也是明白而不容任何人迴避的。精神分析學說的創始人弗洛伊德亦提出人類的二大本能，一是生（性）本能，一是死本能，二種本能二元對立形成心理的一種特殊衝突，趨使生命走向死亡。若然，死亡對任何時代的人而言，皆意味著一個思想個體，一個生命意志的毀滅，這也是死亡為什麼是人類最大困頓的根本原因。

對生命彼岸的另一個世界，永遠存著神秘與好奇，一種無限黑暗延伸，歷來先哲的思慮無不為死亡問題所牽動。死亡既是一個嚴肅而冷峻的事實，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但又完全屬於個人的背負，它者絕不可代替，這便引發死亡成了生命最重要的焦點，所謂生命的價值或人存在的價值，反而需在死的啟示中產生。生命，在死亡的威逼下顯示了重量，人必須通過死亡陰影來檢驗與肯定存在價值，因此死亡成了一個永恆的主題，吸引著文學作家的聚焦點，為我們開了一扇省思的窗。

台灣人是一個諱言死亡的民族，自先秦思想家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道家「生死一體」的觀念，以「道」齊生死，即奠定了重人生現世的人生觀基礎，這種幾千年下來形成的對現存生命的重視，成了中國的人本主義思想的核心。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死亡意識總是受到抑制，是存而不論的。而佛家的「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的「了生死」，

人非一死而是無數的死，生是死的延續，死是生的延續，生生死死構成無始無終的輪？，佛本意乃覺者，追求覺悟生死本質，繼而超越死亡的智慧，改變了漢文化的只重視現世觀思想。

儒、道、佛的思想體系及民間的死亡信仰積澱成文化傳統，歷經長時間的潛移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對死亡的態度，本論文將詳為討論探明。由於中國內戰的浩劫，及內戰後台海分隔事實，臺灣正是處於斷裂失連的信仰危機中，不管是生活調適、行為規範乃至價值意義都被迫進行重整。臺灣在特殊的歷史進展裡，臺灣人共同命運體，共同命運觀的形成，與臺灣人的意識的形成，都走同一歷史軌跡，在所謂主體性認同的不定中，所產生的疑慮、焦急、失根，於不斷尋找存在的因由中，發現沒有確定的回答者，致身份認同的迷失一再上演，其中的晦暗不明也是必須客觀地反映其本來面貌，從抽絲剝繭中明白臺灣人對死亡的態度。

選擇六十年代臺灣小說作為探討題材，乃因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六十年代的小說，除了為戰後自成系統的臺灣文學建立發展上不可少的新典範和國際視野（儘管並不全面），還使文學成為異端的語言，成為對官式文藝政策的意識形態的抗拒（儘管遠非直接有力）。¹又六十年代因霸權統治形態，造成知識分子的政治冷感，被迫從社會中疏離出來；在經濟上「美援」的介入，除了影響臺灣政治外，促成經濟鉅變由農業轉向工業，舊有社會型態也逐漸邁向轉型，人與人間溝通的疏遠，其心理是焦慮、失落、不安、自我懷疑的，正與西方現代主義²興起於批判工業革命後所帶來的苦悶與都會生活的疏離原因有些相

¹ 施淑 現代的鄉土—六七十年代台灣文學 收入於《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文學，1997年），頁305。

² 所謂現代主義，是19世紀工業革命後的物質主義與二次世界大戰的撞擊，在人類內心產生精神空洞之感衍生出來。現代主義基本上可稱為荒原主義，感染19世紀末迄一次世界大戰的悲觀思想，表現在文學上，現代主義的時間觀是斷續的、破碎的個體，強調個人的孤立性，人與人之間難以溝通。由於弗洛伊德學說的興起，現代主義強調意識流及象徵作用。參張之傑，黃台香編：《革新版百科大全書》（台北：名揚，1986年），頁3424。

似，遂在當時接受西方現代主義來面對赤裸裸存在的自我問題。余光中就曾說到六十年代小說作家：

以表現個人的內在世界為能事的意識流小說和超現實詩，似乎為作家提供一條出路。³

六十年代重要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發刊詞亦提到他們追求：

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

分期有系統地翻譯介紹西方近代藝術學派和潮流，批評和思想，……為依據「他山之石」之進步原則。

要向西方文學潮流借鑑而為發行刊物的目的。《現代文學》創辦者白先勇在回顧談及創立的背景時說到：

六十年代初，我們在外文系唸書，接觸西方文學，受其啟發，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但在西方文學的諸多流派中，現代主義的作品的確對我們的衝擊最大。⁴

足以說明六十年代作家，有絕大部分接受了西方文學思潮的洗禮。雖然小說中所呈現的「虛無」、「晦澀」部分迭遭譏評為內容貧乏、思想蒼白、遠離現實，但不可否認地，六十年代培植了大量作家，在小說創作上不管是作品數量，或是視野的開拓、主題的多元、形式語言的創新突破，對台灣現代文學皆產生明顯影響。

³ 余光中：《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總序》（台北：巨人出版社，1972年），頁9。

⁴ 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收於《現文因緣》，頁10。

其次，台灣文學史上的最大流亡圖，出現在六十年代的台灣小說之中，⁵在面對生命無情的摧殘與斲傷，有人以堅決意志對抗到底，絕不輕易低頭；有人自怨自嘆，苟且偷安；有人隨波逐流，麻木度日；也有忿恨不平，自我了斷。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生命困境，自有不一樣的自處之道，當我們閱讀六十年代的台灣小說，發現作品的主人公在面對生命的挫敗時，往往採取死亡態度以消解困頓。如陳映真小說〈將軍族〉、〈鄉村的教師〉、〈我的弟弟康雄〉、〈故鄉〉充滿了死亡的氣氛；白先勇在六十年代發表的作品中，〈玉卿嫂〉、〈月夢〉、〈黑虹〉、〈永遠尹雪豔〉等有十六篇敘及死亡題材；七等生〈僵局〉、〈我愛黑眼珠〉、〈來到小鎮的亞茲別〉等更是有大量死亡書寫；王文興的作品數量不豐，但像〈海濱聖母院〉、〈龍天樓〉對死亡的描繪亦是動人心魄的；施叔青《約伯的末裔》談生命的孤絕意識，大量的在小說中呈現對命運的思索。

文學作品是具現時代社會生活的產物，但觀察六十年代臺灣小說，呈現的面貌是「無根與放逐」，是作家的流亡心靈，文學作品中的流亡精神是一種對現實的消極抵抗，除了企圖在再殖民⁶的時代中留下最響亮的抗議聲音，知識份子自社會疏離出來的一種孤寂感，反映在作品上是生命的毀滅主題，與臺灣民眾的生活脫離。這一特殊現象有著本質上的複雜性，從死亡意義探究，整個時代背景與知識份子的沉重背負，及社會變遷的衝擊下所充斥的死亡氣息，試圖去撥開那陰霾與晦澀，探照人類心靈的掙扎與苦悶。

⁵ 陳芳明〈百年來的台灣文學與台灣風格〉，收入於《百年來的台灣》（台北：前衛，1995年），頁286-287。

⁶ 「再殖民」此詞彙乃陳芳明先生對臺灣新文學史的分期見解，認為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八七年解嚴這段時期，臺灣社會並無得到反省的空間與機會，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帶來了強勢中原文化，無視於臺灣的殖民經驗，因此稱為再殖民時期。惟這一觀點曾引起陳映真、曾健民等人不同看法，有關爭論詳細內容見《聯合文學》178（1999.8）、189-192（2000.7-2000.10）、194-195（2000.12-2001.1）期。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透過文獻的檢閱，對台灣六十年代發表的小說進行全面性閱讀，將論及死亡主題之重要著作加以比較、歸納、分析及討論，企圖掌握該年代小說中所反映的一種人類存在價值的深層意義。在文學理論上將會運用到精神分析學說及存在主義理論，做為理解六十年代作品的依據。二十世紀初期，西方現代文壇最流行的兩大思潮，一為馬克思主義，一為佛洛伊德學說，前者基於政治上的因素無法在臺灣文壇占一席之地，似乎只有向內走，走入個人的世界，感官經驗的世界，潛意識和夢的世界；在世局動盪文化交替的時代，資本主義的興起，人被物化後出現心靈的空虛、疏離，個人去正視並體驗生存的實質，以決定自己的價值。從吸收佛洛伊德到親炙存在主義，這兩種西方文論思潮在六十年代文學作品中自然而然的被借用，⁷成為探索六十年代小說不可忽略的理論。

此外並經由作品內外緣兩個層面進行研探，希望以較完整的角度對主題做分析。在外緣研究上焦點是，對作品外在關係如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歷史背景、西方文藝思潮、死亡智慧的形成等進行剖析。內在研究的工作則著重於作品內容顯露出的死亡人物、情節、意識分類與剖析。

本研究計畫以時代和歷史背景及死亡智慧的探究來處理六十年代小說中死亡思想。經由內、外緣的研究，把握作家吐納的深層義涵及主客觀思想，其透過文學作品來映照死亡這一嚴肅議題，如何在時間已距離我們超過四十年歲月的現今看來，仍呈現一先行者所有的具覺醒力道，撼動我們的心靈。

⁷余光中：《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總序》（台北：巨人出版社，1972年），頁3。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章節架構

主要以六十年代台灣小說所呈現死亡的共相主題為研究對象，這一共相存在的事實，從精神分析學說來看，弗洛伊德揭示了人類心靈的隱秘，?中了人性的痛處，在潛意識的影響下，人類各種內在矛盾鬥爭，所構成的心理衝突及愛慾與死亡的趨向之間的競合形成人生的痛苦，在與整個時代環節的互扣及作家個人的經歷、文化、思想的影響下，創作出有別於五十年代受到思想言論管制，使臺灣文學的發展喪失主體性，成為戰鬥文藝旗下的小兵的文學，而另闢一番新的文學風貌。

至於本文其他各章的架構，大致分為：

第二章：死亡意義探討

死是每種生物的最終結局，萬物消長本為自然循環現象，但人類是異於禽獸的，人類擁合理性思辨能力，有自我意識，不似動物只能對死亡處於被動接受甚至毫無知覺，人類會對死亡的體驗及情緒，不斷經過思考及判別，轉化為促進人類生命的提升力量，追求更為完善的生存意義。所有人類對於理想與目標的追尋，在匍匐往前的道路上，面臨各種挑戰，都會尋求先人經驗與智慧的指引，以為抉擇的依據，尤其是生死存亡的當下，選擇最激烈的死亡安排必定有其不得不然的意義。本章將從中國死亡智慧及西方死亡智慧兩大層面來論述死亡觀的形成與影響。

第一節 中國死亡智慧

中國與西方比較向為缺乏神話的民族，受到社會風俗及民族心態影響，一向忌談「死」、?避「死」，究其因由可從兩方面來探討，一是儒、道、佛家對死亡所持的態度，這三家的思想體系是深遠的影響著中國人數千年來的思維模式，針對死亡的問題上試圖了解其抱持何種智慧。另一方面是民間的死亡信仰，對在漫長歲月中求生抗死、求福避禍的樸民真實生活裡，民間如何釐訂出一套對待生死的溝通方式，以免於恐懼來面對死亡的悲痛，這種死亡觀的實踐是否具有超越的意義，方能以更坦然態度面對命運安排，皆要進行討論。

第二節 西方死亡智慧

西方文藝思潮的引進台灣，包括存在主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等，都在六十年代風靡文壇，蔚為時尚，為沉悶的政治環境及疏離的社會，打開一扇思想窗口。存在主義思索人類存在本真與處境的嚴肅議題，正視人的孑然孤立被拋事實，尤其在兩次世界大戰後，死亡哲學受到相當注目，西方對死亡價值及智慧的研究，透過文學途徑，影響了六十年代創作的意識而呈現於作品上。因此，對西方的死亡智慧必須加以討論，方能全面關顧到六十年代的文學風格，及其大膽探觸人類潛意識及死亡本能。

第三章：六十年代台灣小說死亡主題的成因

本章旨在考察「死亡」這一主題為什麼在六十年代台灣小說中呈現一共相現象？創作者必然受到當時社會背景，包括政治上、經濟上的鉅大變革，及時代思潮、個人生活閱歷影響，此章即以此為立論基點，分別從時代背景、作家處境、作家思想及西方思潮各方面，論述六十年代台灣小說中死亡主題大量出現原因。

第一節 時代背景

文學是社會意識型態的重要組成部分，與社會的更替演進具密切相關，必然反映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陳映真也提到「文學像一切人類精神生活一樣，受到一個特定發展時期的社會所影響，兩者有密切的關聯。」⁸說明時代與文學的互為反映現象，是必須進行考察討論。

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臺灣人民由原先歡欣鼓舞的心情，冷卻到一九四七年爆發全島性的反抗二二八事件，使一些作家噤若寒蟬。隨後在大陸的失利撤退臺灣，國民政府為鞏固領導權，遂實施戒嚴，行白色恐怖活動，在全面的肅清之後，對文藝活動在五十年代是全面控制的，文藝淪為對中共進行喊話的工具。降及六十年代，是國民黨控制臺灣更加嚴密的時期，政治上充滿軍事色彩，⁹知識份子遭受的白色恐怖更為嚴重。

⁸ 陳映真：《歷史的孤兒 孤兒的歷史》（台北：遠景，1985年），頁1。

⁹ 五十年代初期，臺灣省政府主席尚由文人主政，如吳國禎、俞鴻鈞、嚴家淦等，自一九五七年

就經濟面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及國共內戰的延長，使臺灣的農業生產減少，工商發展停滯，日用物質缺乏，通貨膨脹節節高升，經濟面臨破產邊緣。自一九五一年「美援」進入臺灣，雖解救五十年代面臨崩潰的經濟，但國民經濟也產生重大轉型，由農業轉向工業發展。又因美援的介入造就臺灣經濟具有壟斷性及買辦性的官僚資本，在政治上對美國養成依賴的心理，美式價值判斷及道德標準取代了臺人固有傳統觀念。

現代工商社會的緊張、焦慮氣息，個人對國家的前途倍感渺茫，在這樣的情況下，找不到具體的理想去奮鬥，也沒有可識別的敵人可對抗，遂紛紛啟開思想窗口，迎接以追求內在心靈世界的現代主義。

第二節 作家處境

六十年代小說作者大都在戰前出生，而在戰後完成文學教育，親身經歷戰爭前後的年代，曾親眼目睹動亂中的人性，面對六十年代艱辛而苦難的社會環境，生活上的鉅變，加上生命的困頓，致使作家對死亡有更深刻的感受，顯露在作品上的是某種焦躁、徬徨、苦悶的時代氣息。

部分知識份子自大陸出走，充滿流亡的心態，魂縈夢繫故土，文化鄉愁濃得化不開；而本省年輕學子在大統治機器輾壓下，一方面唾棄所謂反共文學，尉天驄曾說「由當時臺灣歷經島內之治安未久，惶恐無著的人們很難與所謂的反共大業結合一起，也就是說就廣大的臺灣同胞而言，反共文學一開始便因為與此地的文學傳統切斷關係，而缺少生根的土壤。」¹⁰另一方面對主體政權不認同，李歐梵認為：「國民黨政府是根據一種政治神話——他們將收復大陸——進行統治的。他們全面樹立權威的手腕不是使人悚懼無語，就是進一步導致人

開始至六十年代末，擔任省主席者全是軍人出身，包括周至柔、黃杰、陳大慶等，其他在警政、交通、財經若干部門也皆由軍人擔任主管職。見許俊雅〈戰後臺灣小說的階段性變化〉收於《臺灣文學發展現象 - 五十年來臺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二）》（台北：行政院文建會，1996年），頁89。

¹⁰ 尉天驄，〈三十年來臺灣社會的轉變與文學的發展〉，收於《臺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台北：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1985年），頁450。

們政治上的冷漠。」¹¹尤其本省作家語言的轉換，政治的高壓，迫使文人有的從此棄筆不寫，或就此沉默下來。其所面臨的現實處境與轉寰空間的壓縮，造成知識分子的價值體系遭受嚴重扭曲，年青生命處於極端束縛及壓迫下，逐漸脫離社會現實關懷，轉而追求個人存在問答。¹²

第三節 作家思想

六 年代作品中的無根、虛無，正如葉石濤曾批評六 年代現代文學的脫離現實：

這種「無根與放逐」的文學主題脫離了臺灣民眾的歷史與現實，同時全盤西化的現代前？文學傾向，也和臺灣文學傳統格格不入是至為明顯的事實。臺灣文學有其悠久的文學傳統，始於明朝末年，從古文學到白話文學有其脈絡可循的傳遞。只不過是四 年代、五 年代的時代風暴，使其不得不斷絕而已。¹³

足見自我放逐或疏離乃是作家不認同於政治當局的體制與反諷的手法之一。六 年代作家正是歐美思潮猛烈衝擊，亦是幾千年來中國傳統劇變的狂飆時代的見證人，目擊新舊交替之秋，這批作家內心是沉重不安的，求諸內，追問人生的存在意義，向西方思潮借取火種，來表達他們當前徬徨的處境。

此外，作家的思想養成也與作者個人成長背景有相當關係，例如白先勇幼年曾得「童子癆」，其作品亦常出現患肺癆的主人公，而其顛沛流離經歷，在小說中呈現飄泊流放悲情。陳映真早期作品表現苦悶市鎮小知識份子濃厚的感傷情緒，便與其父親一代出身於農村的敗落家庭，刻苦自修成為知識份子有關，

¹¹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台北：麥田，1996年），頁177。

¹² 存在主義哲學家尼采強調人的生活重心，應置於自己身上，要人去重視自己生活的本身，除了自己，應沒有其他值得依恃的，故重視自我、認識自我，一切以追求自我為重心去創造生命的意義，才是做為人真正存在的價值。

¹³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1993年），頁116-117。

另外其後父過逝，家道遽爾中落，帶來的挫敗困窘，這種悲哀曾在陳映真青幼年時期留下很深的烙印，蒼白幽暗的調子都反映在其早期作品中。其他如七等生幼年喪父，家庭陷於異常貧困的經驗，在他的小說中的主人公有不少比例呈現赤貧窘境，因此，經由瞭解作家思想，更能準確掌握作者所表達的深義。

臺灣在六十年代已進入工業化型態，社會的變動速率加快，節奏的快速變換移動中，使人對時間失去永恆感認知，而產生疏離感；對空間感到陌生，而有孤獨無助的空虛。盧卡奇指出西方現代主義對人類的歷史失望，「於是揚棄歷史乃是直線發展的意念」，因此導致視外在世界乃頑冥而疏離的令人失望，從而對外在世界喪失興趣。¹⁴臺灣與西方的疏離特質相類似，乃使現代主義有機會契合於臺灣。另一方面臺灣經濟依賴美國，又是美國太平洋西岸的軍事基地，自然挾帶優越的西方文化進入臺灣，加上重要文學刊物大量介紹西方理論與作品，青年作家在欠缺偶像的文壇上，自然轉向西方去尋求學習的對象。

基本上六十年代的生存環境，戰禍已遠離，但侵襲現代人心靈的冷戰卻悄悄上了歷史舞台。工業科技、物質文明所帶來的都會單調生活、人與人間的緊張、競爭、不信任關係，乃借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從人類心理層面入手，解開受壓抑的慾能，利用意識流手法透視人類內心陰暗低沉的世界及自我的發現。以存在主義的反理性、追求絕對自由、人道精神來建構理想，並借文學創作，適時宣洩抑鬱、荒謬、支離破碎的心靈悲慟。

第四章：六十年代臺灣小說死亡主題分析

本章就六十年代臺灣小說中呈現的死亡人物及類型探討，並將死亡主題及因素分為對舊社會的維護與反抗及生存意義的追尋兩大類，以尋找死亡事件所蘊涵的深義。就臺灣的歷史與命運言，知識份子的傳統價值體系遭到切割，不管是文學上的傳統，包括五四以來的中國傳統及臺灣本土的文學傳統，或社會結構的急遽變化，都使知識份子追求理想的過程裡，始終陷入茫然的零碎拼湊中，而死亡反成為生命的出口。本章研究作品的死亡事件，印證小說中隱藏的

¹⁴李歐梵：《中西文學的徊想》（台北：遠景，1987年），頁27。

深沉悲痛、孤寂感和和急欲反擊的焦慮，正是時代動盪，國家主體認同失落的寫照。

第一節 死亡人物的類型分析

本節分別就作品所述及的死者身份、死亡情節、死亡方式以表格分類整理並分析。不管是自然或非自然死亡，尤其是自我意志決定結束生命的方式，是既自由又束縛的弔詭，都應進行理解，透過討論小說人物的死亡，挖掘出作者對死亡事件、人物安排所欲陳述的目的。

第二節 死亡因素及主題（ ）—舊社會維護與反抗

本節將分析死亡事件中的因素，瞭解六十年代小說對舊社會緬懷與試圖變革所大量表現死亡原因。分為四個方面探討，一、對舊社會的力挽狂瀾，歷史的鉅變，繁華富貴霎時成煙雲的悽悽；文明的入侵，農業社會的瓦解，一批批老人的黃金歲月已逝，傳承的無著，都透過作者的緬懷，引領出一代盛世的衰微之悲。白先勇的〈遊園驚夢〉〈永遠的尹雪艷〉；黃春明的〈溺死一隻老貓〉；鄭煥的〈毒蛇坑的繼承者〉等都呈現一種與社會脫節關懷之情。二、臣服於宿命思想觀念而影響人生道路的進行包括陳映真〈死者〉、〈貓牠們的祖母〉；王禎和〈三春記〉；江上〈命運〉；王文興〈海濱聖母節〉；白先勇〈遊園驚夢〉等等都描寫了面對命運的無助感。三、是為反抗傳統的禁錮，如七等生〈結婚〉中的曾美霞；陳映真的〈將軍族〉三角臉與小瘦丫頭間的愛情；葉石濤〈男盜女娼〉中描述傳統女性犧牲於家庭困境的非人生活之反擊；七等生〈網絲綠巾〉的費木奴以死嘲弄傳統制約的無意義。四、女性出走的衝突因素可在白先勇的〈黑虹〉、七等生的〈私奔〉、陳映真〈唐倩的喜劇〉中看到女性覺醒種籽萌芽，採取出走方式所帶來的衝擊與悲慘結局。

第三節 死亡因素及主題（ ）—生存意義的追尋

避談政治社會問題，轉向個人對自我存在的探索，勇於深掘內心世界，完整呈現六十年代對生命的沉思與反撲。分五個方面探討，一、生存價值的否定，此一因素，幾乎是六十年代多位作家的表現主題。如七等生〈我愛黑眼珠〉，痛斥存在的矯情，對付荒謬的存在手段便是死亡；陳映真〈鄉村的教師〉、〈第一件差事〉、〈兀自照耀著的太陽〉追尋生存價值受挫與喚醒他人正視生存意

義的探討。二、是以一種對抗死亡而採取的超越死亡態度，如白先勇〈玉卿嫂〉及〈那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中的王雄；陳映真〈蘋果樹〉中廖生財妻子。三、戰爭因素導致的大量死亡如王文興〈龍天樓〉；白先勇筆下亦有多篇描寫戰爭死亡作品；陳映真〈文書〉中安某，因戰爭的殘殺夢魘導致精神疾病，而產生幻覺殺了妻子的悲劇。四、性的迷惘與衝突因素，弗洛伊德認為「性」在人生當中佔著很重要的一環，因為性的異常而導致死亡，如王文興的〈最快樂的事〉；陳映真〈獵人之死〉及〈貓牠們的祖母〉；施叔青的〈瓷觀音〉也從性與死亡的糾纏角度寫人類的欲望。五、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似乎是一個永恆的主題，白先勇〈芝加哥之死〉、〈謫仙記〉；七等生〈精神病患〉、阿水的黃金稻穗；陳映真〈加略人猷大的故事〉都同時出現理想在現實考驗下的鎩羽悲劇。

第五章：結論。絕望苦難的時代裏，那些盡力為生存及尊嚴奮鬥的人，他們昂揚的生命力。彰顯的正是人類意圖伸張的「生命意志」，死亡在生命中顯出重量，同樣的，生命也在死亡襯托下展現了不屈的韌性。